



# 刻骨铭心的少年岁月

## 香港51年届千仞(梁凤翔) 上



相信不是每个人小学毕业的时候,都唱过学校专有的毕业歌,我可是唱过的。我们那毕业歌选用了《故乡的亲人》的现成曲谱,这是名曲《老黑人》的作者福斯特另一首不朽名作,曲调优美悦耳,荡气

回肠,于真挚纯朴中带着惆怅感伤,正切合少年毕业生即将劳燕分飞、惜别互勉时的心情,至于填写的歌词,则不知出自母校哪位高手,竟能令词曲配合得那么和谐自然,完美无瑕。有回收听电台音乐节目,那熟悉的旋律再次在耳畔回旋。

我情不自禁,又跟着唱起了我那首毕业歌:

**学问至无穷,高小毕业,学力尚未充;一得毋自封,如登山须达最高峰。努力再加功,欲高飞先求羽毛丰;勉**

**哉少年,发奋为雄,破万里浪乘长风。**

这首令我刻骨铭心的曲子67年来也不知反复唱过多少遍,对我来说,它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,因为它凝缩了我少年时代思绪情感的全部内涵。

我的小学母校,就是当年雅加达的华侨公学,正校在石桥头(Jembatan Batu),我们就读的是第一分校,位于"大公司"(Kongsi Besar)这条街,后来又另有第二分校设在新巴刹(Pasar Baru)。

那时,我的家离学校不远,步行上学用不了十分钟。出了家门,沿着电车轨向右走,走完整条"八茶罐"(Petekuan)街左转,那就是"大公司"街了。华侨公学就坐落在这条街的中央一侧。校舍是两层楼的大院子,庭院深深,前后上下设有十几个教室,一个教员办公室,楼上还有间住校老师的宿舍。师生们没有户外活动场所,只有个室内小操场,整所学校看不到一点儿花草树木。就是在这么个封闭式的学习环境中,我完成了生命初阶的小学课程。

推算起来,我是在1940年下半年刚满六周岁时,由祖母牵着报名入学的,还清楚记得开学之初的情

景:置身于陌生的课室里、孩群中,我怯生生地坐在座位上,不时从课室旁的大天井向楼上张望,求助般地寻找已升入三年级的姐姐的身影。不过我很快就适应了。一年级的课程,不外国语、算术、唱游、手工、体育几科,除了手工剪贴需要父亲指导外,其余对我来说似乎都轻而易举,"手拍手,拍拍手"、"手一拍,球一跳,拍得重,跳得高。"一课书讲完,我就已经会背默了。抄写生字,我常常别出心裁,不是照着横排或竖排顺序,而是随心所欲,这儿填写一格,那儿填写一格,或是按斜线写下去,到底后再朝折射方向写,恍似桌球在台框中撞击前进一样,直至写满整页为止。我把习字和游戏结合起来了,怡然自得其乐。

清早上学有姐姐带领,但是低年级放学放得早,这便要劳动祖母来接了。老人家疼爱孙子,每天总是带伞出门,大热天为我蔽烈日,阴雨天护我挡风雨,归途中偶或见到印尼人挑担卖的"清糟酪"(Cincau),祖母也总舍得掏钱赏我一杯,供我清热解暑,清凉甜滑的印尼Cincau还真合我胃口,因而

从不拒绝。

升入二年级,上学期还没读完,局势突然紧张了起来,从大人神色凝重的言谈中,我捕捉到了其中要点:日本偷袭珍珠港,美国对日本宣战;日本鬼子就要打过来了。当局开始实行灯火管制,夜里时常停电,令全城一片漆黑,好几次半夜里响起凄厉的慑人心魄的警报声,我睡梦正酣,也唯有在迷糊中随着家人跑到近郊躲空袭。

不久,学校给家长发了通知,母亲按指示给我缝制了一个小布袋,上学出门就挂在胸前,袋里放了张贴着我的小照的硬纸卡,写上了我及家长的姓名、地址等等,还有万金油、八卦丹、纱布、棉花等药物,另有一块软胶。老师指导我们说,硬卡是准备战乱中用以辨别身份的,遇到敌机空袭,要赶快趴在地上,用棉花塞耳,咬住软胶,以免震聋耳朵,震伤齿舌。想到爆炸声中血肉横飞、与亲人失散的可怕景象,我的心不由得紧缩起来了。

不久,学校便停课了。全家十几口人,经历了三次分批逃难的艰辛。我上有兄姐,下有弟妹,兄姐可以帮手,弟妹离不开双亲,因此每回



1955年采访万隆会议

1955年采访万隆会议